

自 1980年2月起,在老一辈革命家的主持下,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平稳地进行了3次重大的组织机构调整和相应的人事变动,对自身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

胡耀邦十次拒绝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提议

1980年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时,决定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这次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邓小平在当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是改革党中央领导制度的第一步;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8月30日至9月1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召开。9月10日,会议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务院部分组成人员进行调整的建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接受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以及陈永贵要求解除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又过了几个月,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邓小平认为应由年轻一些的同志直接进入领导第一线,并提议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先后10次坚辞不就

胡耀邦热衷于思想理论宣传,渴望搞好经济建设,抑或也有过当教育家的梦想,他愿意做个好助手;但他从来没有“指点江山”的领袖欲望。所

以,邓小平的建议是他难以接受的,他本能地推辞了。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中间休息时,胡耀邦在勤政殿的走廊里企图最后说服别人支持他的意见:“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好。”

这类话他在与邓小平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先后多次谈到过。胡耀邦认为,党和国家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非常需要有邓小平这样无论在资历、威望还是在才干上都非常卓越的老革命家掌舵,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因而对这一职务,他在会上会下坚持不就,共达10次之多。然而,在最后一次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邓小平用异常严肃的口气对他来说:这是组织决定,党员必须服从!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胡耀邦当时虽然也同意“根据这一段的工作来看,换人是势在必行”,但不赞成马上对人事做调整,建议等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做决定。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他提出:“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就这样,人事问题定下来了。

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第九次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还是表示:“几位老同志提

名我担任党的主席,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不是什么谦虚,确实不够格。我也不同意……小平同志曾经说,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是同意的,但是,当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终做出了人事变动。会议通过了3项决议:1.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会议决定:前两项建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等6位为副主席。

当选党中央主席谈3点意见

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6月29日下午,胡耀邦向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谈了他的3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和常委的同志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4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

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我们的党还有一些建党前期的老革命健在,并且在党的领导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实在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幸运。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我是在我们党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威望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合适……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哪里使?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接着,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据《快乐老人报》)

周恩来为何破例为恩师之子找工作

1910年,奉天关东模范学堂里,一个浓眉少年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外宾,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您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时,周恩来回答:“少年时代,在沈阳读书时,得到山东高亦吾先生的教诲和鼓励,这对我是个很大的促进。”

高亦吾为周恩来命字“翔宇”

高亦吾,字盘之,山东省章丘县(今章丘市)人,1881年出生在一个家学深厚、颇有名望的耕读之家。他自幼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12岁时,在私塾就已读完四书五经,16岁时自设私塾,教育蒙童,惠及乡里。1907年高亦吾通过府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山东高等学堂历史科深造。

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同盟会,也先后以山东青岛、烟台和济南等地为重点,尤其在这些地方的中高等学校进行了组织大发展。高亦吾很快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反清反帝的英勇斗士。加入同盟会不久,他先后在高等学堂的同学中组织成立了“乐群学会”和“玫瑰花诗社”。

1909年8月,由于清朝政府的屈膝妥协,山东各界兴起的争取路矿权利斗

争遭到失败。高亦吾即以“乐群学会”和“玫瑰花诗社”的成员为骨干,发动组织领导了山东高等学堂学生的反清反帝斗争。他们脱下长衫,剪掉发辫,上街游行示威和集会演讲,轰动了整个济南。清朝政府密令通缉带头闹事者。高亦吾在几位同学帮助下,逃出了济南。

1909年末,高亦吾辗转来到东北奉天,在族兄的帮助下,被聘为历史教员。转年秋天,年仅12岁的周恩来,由时任铁岭税捐局主任的三伯父周贻谦从家乡淮安带到铁岭,在银冈书院读书,后转入东关模范学校。

周恩来对这位在光绪末年就敢于剪掉发辫,洋装革履,被人视为“怪物”的高老师非常尊重景仰,而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的少年也非常青睐。课下他常向周恩来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语气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让周恩来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

在高先生影响下,周恩来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南迁天津,入南开中学就读。师生临别之际,高先生寓意深远地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

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

高家后人与总理情意不断

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高亦吾辞职赴北平,在某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前往探望。后周恩来在天津被捕入狱,高亦吾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奋力营救,终助周恩来脱离虎穴。后来,高亦吾重返济南,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他对故乡的水利建设极为关注,曾两次提出设计章丘绣江河金盆水电站、兴修惠灌渠。“七七事变”后,他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问渊博、名扬乡里,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道郭德夫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去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为了维持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

1941年春节刚过,高亦吾突患脑膜炎,久治不愈,弥留之际,他将全家唤到身边,再三叮嘱儿子高肇甫:“你日后可去找周恩来,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要记住,听他的安排,跟着他不会走错路。”2月5日,高亦吾与世长辞。

1949年7月,高肇甫遵父遗嘱给在京的周总理写信,历数其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即接到总理回信,又找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

小时之久。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辞别人间,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在北京,高肇甫娶妻生子。1953年,中央机关人员下放充实基层,高肇甫积极报名申请下放,总理非常高兴,亲自召见鼓励他说:“你做得很好,你是我的亲朋好友,应事事带头,下去后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做好工作。”高肇甫激动得难以措词,只有热泪盈眶地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总理笑着说:“以后不要老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就这样,高肇甫到了淄博矿务局,该局的档案室就是高肇甫带头建立起来的。

1961年7月总理来信邀请高肇甫全家去北京相聚。2008年,年近九旬的高肇甫回忆当年和总理相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总理不时夹菜递到孩子们的小嘴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得的午餐。离别时,总理想留下我小儿子,小儿子以为我们要走,便说‘俺不!俺不!’总理笑着说:‘他是地道的山东话!’”周总理还提议和高家人合影。

(据《沈阳晚报》)